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8.04.013

上古汉语植物名语义造词探析

谭宏姣

(吉林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研究所,吉林 四平 136000)

[摘要] 语义造词是利用语义的分化来创造新词的方式,是汉语名物词滋生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汉语词汇积累的派生阶段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上古汉语植物名的语义造词主要通过原词的语义引申与源义素的孳乳派生。上古汉语植物名的语义造词往往伴随着语音或字形的改变,客观上促进了古汉语植物名专用字的迅速累增。汉语植物语义造词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结果,其中隐喻与范畴化在此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上古汉语;植物名;语义造词;认知

[中图分类号] H1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18)04-0082-06

在汉语史研究中,汉语词汇的发生、演变、积累等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它不仅涉及传统训诂学关于事物“名义”的探讨,还关涉到我们如何认识词义之间的联系、词义的发展演变等一系列关于语言词汇的本质问题。

根据王宁先生的汉语词汇发生与积累的理论^{[1]167-178},我们可以认为,汉语词汇中原生阶段的原生词,其音与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具有任意性的特点,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除了原始词汇以外,语言里的新词往往在旧有词的基础上创造产生,其新词的产生方式为合成与派生两种。合成造词的理据分析和构词法上语素的分析是重合的,主要造词方式是词根复合法和加缀派生法,其内部理据关系较明显,前者如“卢橘”(橘之黑者)、“香楠”(楠木气香)、“苦楝”(楝木果实味苦),后者如“麦子”“橘子”等,但是这些合成词中的单音构词语素“橘”“楠”“楝”“麦”的得名理据就比较隐晦,需要特殊探寻。周秦时代的汉语词汇语义派生造词最为复杂与重要,这种造词方式就是通过原词语义的借用、引申、分化来创造新词,这不仅促进了这一阶段汉语同源词的迅速积累,而且由于字对词的分离作用,专名汉字在此期间也迅速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在周秦时代的上古汉语中,

名物词成为同族词中的主体,“在原始汉语至上古汉语时期生成的同理据义衍同族词群更是突出地呈现出名物性特征”,“多数义衍同族词群的主体都是名物词”^{[2]130}。因此,研究古汉语语义造词应该重视名物词的命名造词方式,这对于探寻名物语源以及揭示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十分重要。本文试对上古汉语植物名这一义类的语义造词问题进行详尽分析,以管窥豹,试图更好地认识名物词的语义造词方式、特点以及汉字对新词语义分离影响的内在机制等问题,并将这一问题作为引玉之砖,供方家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上古汉语植物名语义分化与新词派生

张永言先生曾就语言词汇系统中新词的创造进行过深入探讨,认为在旧有词的基础上创造的新词往往有其理据可以求索和论证^{[3]9-14}。新词的派生主要是通过原词语义的引申、孳乳、借用、分化而形成,新词内在的语义内容与外在的语音形式都与原词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决定了新词与原词之间的“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表现为原词概念义引申派生出新词与原词语根所承载的源义素孳乳派生出新词。

(一)原词概念义引申分化与新词派生

原词所表示的概念义进一步纵向引申,语言

[收稿日期] 2018-02-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298);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7B136)。

[作者简介] 谭宏姣,女,吉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所长,教授,文学博士。

表义的明晰性与区别律客观上要求语言对原词的语音形式或者字形方式进行改变,从而为这些引申出来的概念创造新词以表示新的意义。

植物萑菜,因宿根自生而命名,得名于“息”之意义引申。息,滋息、生长。《释名·释言语》:“息,塞也,言物滋息塞满也。”《汉书·卜式传》:“式既为郎,布衣草屨而牧羊,岁除,羊肥息。”唐颜师古注:“息,生也。”植物名“萑菜”取名于“息”之滋生义,因其根为宿根,年年滋生不已。《尔雅·释草》:“菲,萑菜。”清郝懿行义疏:“陆玑《疏》云:‘萑菜,今河内人谓之宿菜。’……按,此菜极似萝,野地自生,宿根不断,冬春皆可采食,故云萑菜。”可见,萑菜之名来源于原词“息”(滋息、生长)义,其别名“宿菜”也得名于该植物宿根自生、年年滋生不断的特点。“息”的概念义为“滋息、生长”,词义进一步引申为能够年年生生不已,滋生不断的植物“萑菜”。

裹,古代的一种播种方法,即翻开耕地表层,在下面湿润的土上播种,再将表层的土覆盖上,以待其发芽。《说文·衣部》:“《汉令》:‘解衣而耕谓之裹。’”清段玉裁注:“此裹字所以从衣之本义惟见于汉令也。”这里的“解衣而耕”就是翻开耕地表面播完种子后再覆盖上的一种古老的播种方式。因为“裹”含有“包裹在内”的语义特点,所以语义分化为瓜皮中所藏的瓜实,即瓢。《玉篇·瓜部》:“瓢,瓜实也。”《正字通·瓜部》:“瓢,为瓜中实,与犀相包连,白虚如絮有汁。”汉刘楨《瓜赋》:“蓝皮蜜理,素肌丹瓢,乃命圃师,贡其最良。”晋傅玄《瓜赋》:“细肌蜜理,多瓢少瓣。”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西瓜》:“其棱或有或无,其色或青或绿,其瓢或白或红,红者味尤胜。”又可指果肉,《神异经·南荒经》:“实长九尺,围如其长,而无瓢核。”唐白居易《荔枝图序》:“瓢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

以上两例中原词的语义分化造词都表现为原词概念义的词义引申分化,如“息”的概念义“滋息、生长”引申为“年年生生不已,滋生不断的植物”,从而创造出新词“萑菜”。“裹”的概念义“翻开耕地表层,在下面湿润的土上播种,再将表层的土覆盖上,以待其发芽的一种古代播种方法”,从而分化派生出新词“瓢”,表示“瓜皮中所藏的瓜实”或“果肉”。

植物浮萍名为“藻”、“蕪”,分别得名于“漂”和“瓢”的语义分化。“漂”本义为浮,《说文·水部》:“漂,浮也。”植物浮萍的主要特征是漂浮于水面,故命名为“藻”,《广韵·宵韵》:“藻,《方言》云:‘江东谓浮萍谓藻。’”《玉篇·艸部》:“藻,萍

属。”元仇远《新安郡圃》:“古树巢空群鸟散,荒池沙满碎藻干。”浮萍又名“蕪”,取义于“瓢”。瓢,剖葫芦做成的舀水、盛酒器,因体轻而能浮于水面,其语源亦为“漂”。《说文·瓠部》:“瓢,蠹也。”清朱骏声通训定声:“一瓠剡为二曰瓢。”晋郭璞注《尔雅·释草》:“萍,萍:‘水中浮萍,江东谓之蕪,音瓢。’”《广雅·释草》:“蕪,萍也。”清王念孙疏证:“字又作蕪……蕪之为言漂也。”由此可知,植物浮萍名“藻”、“蕪”产生的语义分化与新词派生的方式是:“漂”的概念义“浮”引申为“浮萍”与“浮于水面的剖开的葫芦”,从而创造出新词“藻”和“瓢”,“浮于水面的剖开的葫芦”又进一步引申为“漂浮的植物浮萍”,又造出新词“蕪”,至此,由“漂”的语义引申分化派生出两个植物名“藻”与“蕪”,共指同一植物浮萍。这个例子显示,有时同一植物的异名来源于不同语义的分化,但所含造词理据却是一样的。

(二)原词源义素孳乳繁衍与新词派生

原词语音所承载的源义素不断横向孳乳繁衍,由源义素串联起“音近义通”的一组同源词,这些同源词皆来源于原词这一语根,根据词义系统的互补分布特征分别为这些同源词创制新的字形(原词字形部分改变或全部改变)或与原词相近的语音形式,从而创造一组新词以分别表示新的语义。我们说这种新词与原词联系的扭结点就是语源,西方近代语义学称为词的“内部形式”,传统训诂学名之为事物的“得名之由”,用义素分析法分析则为源义素^{[4]82-87}。由这种语义分化而派生的新词,尤其是单纯词,特别是一些渊源古远的植物名,其语源义就不那么明显了,这时就需要通过历史语言学方法,如通过“经以同训,纬以声音”,即“音近义通”的方式勾稽汇集同源词,利用综合考察的方法探寻同源词的源义素,追根溯源,寻其语源,明其理据,从而考释出植物名新词产生的语义造词理据。

榘,木名,质地坚硬,古时可作车材和弓材。《周礼·考工记·轮人》:“斩三材必以其时。”汉郑玄注:“三材所以为毂、辅、牙也……世毂用杂榆,辐以榘,牙以榘也。”牙,即辘,车轮外框,当以坚韧硬实之木为之。《尔雅·释木》:“柎,榘。”晋郭璞注:“材中车辘,关西呼柎子,一名土榘。”榘,犹彊、蠃、僵,皆有源义素“硬”。彊,本指硬弓。《说文·弓部》:“彊,弓有力也。”“彊”在古文献中多表强弱之强,字亦作“强”,此义与硬义相关。僵,僵硬。蠃,《玉篇·虫部》:“蠃,豁蚕。”《正字通·虫部》:“蠃,蚕白不朽。……本作殭。《本草》:自死者名白殭蚕。蚕病风死自白,死而不朽

曰彊。”可见，语根“* kjiang”孳乳派生出一组同源词“彊”“蠓”“僵”“疆”，承载着同源词共有的源义素“硬”义。通过探求源义素，我们得出植物名为“疆”是语根 * kjiang(为“硬”)的分化滋生的结果。

藕，荷的肥大多节的根茎。《尔雅·释草》“荷，芙渠。……其根藕。”《玉篇·艸部》：“藕，荷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啜菹藻，咀嚼菱藕。”“藕”之名称源于根茎之多节相连。按，从禺声字往往有多义。鰐，今斑鱼，皮多条纹。《说文·鱼部》：“鰐，鱼名，皮有文。”文者多采、多线条，是若为皮有多采、多线条的鱼。喁，鱼水中群出而口露水面啞动貌。《说文·口部》：“喁，鱼口上见。”鱼在水中群出动口貌(《文选·吴都赋》注)。耦，本义为多耒的一种农具，耦耕指二人组合的一种耕作形式。由此可知，语根“禺”有“多”之源义素，孳乳派生出“鰐”“喁”“耦”“藕”一组同源词，新词的产生来源于“禺”之“多”义的语义分化和孳乳派生。

分析以上两种语义造词方式，我们发现，第一种语义造词方式是由原词概念义的引申分化派生出新词，这种方式创造的新词命名理据较明显，它们是原词概念义的引申，或扩大，或缩小，或转移，根据对原词语义分析，较容易得出新词派生的途径和轨迹。第二种语义造词方式是由原词语源义的孳乳繁衍派生新词，这种方式创造的新词命名理据较隐晦，必须通过构建同源词进行综合比勘，分析其共同的源义素，才可以得出新词派生的内部形式或理据。

二、上古汉语植物名语义分化与音形改变

语义造词主要是利用意义的变化来创造新词，其中可能伴随着语音或字形的改变。“从同源分化的角度看，判断词的分化，判断新词的派生，首先应该考察该意义的独立程度，即看它是否发生了义变，其次应注意考察是否发生了音变或形变。在确定义变的基础上，只要能证明有音变或形变发生，便应该承认这个意义已经独立成词。原词与它的关系已经变为所从派生词与派生词之间的关系，而不再是该词的本义和它的整个引申系统与某一引申义之间的关系。”^{[5]148} 上古汉语植物名通过语义分化创造新词，其方式有两种：

(一) 语音变化

伴随着词的语义分化往往存在着语音的变化，即单音节内部要素声母、韵母和声调的改变，从而通过意义的变化来创造新词。

1. 声母改变

当(相当。端纽·阳部平声)→葛(即商陆，枝叶相当。透纽·阳部平声)

续(接续。邪纽·屋部入声)→粟(《说文·田部》：“嘉谷实也，从米。孔子曰：‘粟之为言续也。’”清段玉裁注：“孔子以叠韵为训也。嘉种不绝，蒸民乃粒，禹稷之功也。”心纽·屋部入声)

金(本为金属，特指黄色。见母·侵部平声)→芩(或作荃，色黄。群母·侵部平声)

2. 韵母改变

蕃(白色。元部·並母平声)、皤(头发白。歌部·並母平声)→繁(白蒿。元部·並母平声)

黥(墨刑。阳部·群母平声)、羖(黑色的公羊。鱼部·见纽上声)→柜(黑黍。鱼部·群母上声)

久(长久。之部·见纽上声)→韭(宿根久生。幽部·见纽上声)

3. 声调改变

圭(上有两道纵纹。见纽支部·平声)→桂(叶片中有纵纹三道。见纽支部·去声)

侵(侵入。清纽侵部·平声)→楸(木桂，辛味浓烈，可排斥其他杂木，自成一林。清纽侵部·上声)

皎(白色。见纽宵部·上声)→茭白(茎中有色白之物。见纽宵部·平声)

4. 声、韵、调中的两项或三项改变

埋(埋入。明纽·之部平声)→麦(厚种深埋。明纽·职部入声)

短(短暂。元部·端纽平声)→椹(花开之时短暂。元部·定纽去声)

柳(南方朱雀七宿的第三宿，有星八颗，排列形状弯曲象鸟嘴。幽部·来纽上声)、倮(背脊弯曲。侯部·来纽上声)→樛(向下弯曲的树木。幽部·见纽平声)

由旧词向新词的创造过程中，语音上的改变主要表现为声母改变的最多，其次是改变声调，改变韵母的数量最少。有学者将这种上古汉语词汇派生的方式概括为语音—形态学构词法，即利用语音手段(包括音素交替、重音转移、声调变换等)造成词形变化以滋生新词的方法^{[3]82}。我们认为，这种新词产生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语义的最初分化派生所致，意义的改变是根本，其次随着意义的变化，外在的语音形式也随之变化，最后表现在字形上也发生变化，从此完成旧词向新词的变化和创造。

(二) 字形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意义的分化伴随着语音变化

的同时,绝大多数时候也有着字形上的改变。俞敏先生就曾指出:“在先秦的文献里,有不少派生新词的痕迹。随着新词的产生,往往也造出新字来。”^{[6]300}为新词创制新的字形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部分改变原词字形;另一种是全部改变原词字形,创制新字。如王力先生曾经提到一个有趣的为新的名物词创制新字的现象,他举的例子是:“甘”派生出“柑”,“刚”派生出“钢”,“疏”派生出“梳”,“比”派生出“篦”,“援”派生出“猿”,“虐”派生出“瘡”^{[7]169}。其中除了“援”派生出“猿”是字形的全部改变外,其余的新字皆为原词字形的部分改变。其实“猿”还有一个异体字为“猿”,《玉篇·犬部》:“猿,似猕猴而大,能啸也。猿,同猿。”从“援”到“猿”是汉字部首的改变,也属于部分字形改变之例。下面我们具体分析植物名语义造词的这两种字形变化的模式:

1. 原词字形部分改变

字形部分改变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原词上标记形符,如,“芬”为香义,加形符为“栳”,表示香木。《说文·木部》:“栳,香木也。从木,夆声。”清段玉裁注:“夆为艸香,故栳为香木。”其他如“葛”(“当”加形符草字头)、“桂”(“圭”加形符木字旁)、“荃”(黄芩,“金”加形符);另一种是改换原词形符,以植物类形符为标记,上文中“凋”向植物名“桐”的意义分化时,读音上发生声母的改变,即端纽变为照纽,但字形上只发生了部分变化,即改换了形符。其他如植物名“侵”(“侵”改换形符单人旁为木字旁)、“茭”(“皎”改换形符为草字头)也属于这种情况。

新词的派生和创制是语言表达中为表义清晰而做的有区别原词作用的工作。但需要注意的是,古汉语由原词派生出新词的过程并不都是一蹴而就的,有时这个过程还显得有些曲折。如俞敏先生对古汉语派生新词的模式进行过探讨,他指出:“本来只有一个语词,一般地说也只有一个形体。后来在第二阶段,有了两个形体了,可是分配不定,新形体也许记早出的语词。在第三阶段,两个形体分配定了。多一半儿是新形体表示新生的词。可是也有倒过来的。”举的其中一例是“知”和“智”:在早期文献里,“知”是动词,表示知道、知晓,后来发展出来一个名词“知识、知觉”,这个读音和形体至今没有分化;还引申出一个名词“智慧”和一个形容词“聪明”,这时分化出一个新的形体“智”,但这一段分配习惯不定,有时用“智”倒回去表示早生的词,如《墨子·耕柱》:“岂能智数百岁之后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也……’”最后分配定了,

“知”代表动词和当“晓得”讲的“知”,“智”代表名词“智慧”和形容词“聪明”,《孟子·公孙丑》说“智足以知圣人。”就让两个形体适当地分工了^{[6]300}。

古汉语植物名的新词创造也存在着这种原词与新词交织黏着的情况。如上面王力先生的例子“甘”加形符偏旁为“柑”,特指柑橘类植物,从“甘”到“柑”的创制过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甘,本义是美味。《说文·甘部》:“甘,美也。”清段玉裁注:“甘为五味之一。而五味之可口皆曰甘。”甘由“美味”义引申出“甜”“美味的食物”“美好”等多个意义,其中有果名,表示柑橘类,《洪武正韵·覃韵》:“甘,果名;俗作柑。”晋潘岳《笙赋》:“披黄包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醪。”《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六引《风土记》曰:“甘、橘之属,滋味甜美。”《宋书·张畅传》:“知更须黄甘,诚非所吝。”宋罗愿《尔雅翼·释木二·橘》:“橙之芳用在皮,甘之甘在瓢。”这里的前一个“甘”显然指的是柑橘,后一个“甘”用为表本义美味,可见这一阶段植物名“柑”还没有创制出来。汉语后来专造植物名“柑”表示柑橘。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下:“柑乃橘之属,滋味甘美特异者也。”唐杜甫《树间》:“岑寂双柑树,婆娑一院香。”

此外,在上古汉语植物名中也存在用同字形标记两同名植物的现象,这也表现了汉语利用加注形符以区别同名的办法在其初期阶段存在不完善的痕迹。例如,《尔雅》中的木名“权,黄英”与草名“权,黄花”共用“权”表示,字形并没有从草的标志。《尔雅》中的草名“杨,枹蓊”与木名“杨,蒲柳”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2. 原词字形全部改变

植物名新词对于与其有源流关系的旧有原词来说还可以表现为字形上的全部改变。如植物名新词语音改变中提到的例子:“粟”之于“续”,“秬”之于“黥”、“殺”,“韭”之于“久”,“麦”之于“埋”,“楫”之于“短”,“葑”之于“黠”、“黠”,“藜”之于“蕃”、“蟠”,“樛”之于“柳”、“倮”。这类植物名新词与原词的同源词关系不同于由字形部分改变而构成一组同源词的情况。我们知道,如上文中的“刚”与“钢”、“圭”与“桂”、“皎”与“茭”、“凋”与“桐”等同源词,学术界常称为“声符兼义”的同源词;而如“属倮”(短剑)、“侏儒”(矮人)、“椳儒”(梁上短柱)、“蠪螭”(即蜘蛛,体短),它们都有“短”之语源义,传统训诂学称这样的同源词为“声近义通”的同源词,由原词与字形全部改变的新词构成的一组同源词即属于此类,因此这类植物名新词的命名造词理据就比较隐晦,需

要借助古音学的重建、音变规律的确立、同源词的比勘才可以探明。

植物名在语义造词时,新词与原词间只是读音有变化而字形不变,这种情况我们暂时没有发现。音变的同时往往有形变的伴随,正如上面所举的例子。但反过来,语义造词时只伴有形变而没有音变,这种情况却是最多的。也就是说,汉语通过创造专名用字的方式加快和巩固了原词语义分化与孳乳派生的可能,从而使新词从原词意义中独立出来,产生大量的同源词,也实现了汉字的迅速累增。可见,在汉语中,汉字对词的分离作用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三、上古汉语植物名语义造词的认识解释

植物名作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其命名形成和所有词形成一样,也应该有两方面作为前提条件:人们的认知思维活动与作为造词基础的语言要素。词的形成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语言要素,它包括语音、语义、语法、修辞等,本文讨论的语义分化造词就是人们利用原有的词语作为原料,通过利用语义手段和方法来创造新词,它是词汇派生阶段名物词产生的重要方式方法,上古汉语植物名(单音的和双音单纯词)多产生于此种方式。此外,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思维活动也是词形成的另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属于人类的心智认知层面。汉语植物命名造词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结果。也就是说,植物命名反映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从植物命名造词的考察中可以深入了解人们在植物命名过程中的意识与思维活动。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Cognitive Strategy)主要包括:体验、范畴化、概念化、意向图式、认知模式、隐喻转喻、识解、激活、关联等^{[9]14}。从上古汉语植物命名造词的分析中,我们认为隐喻与范畴化认知活动在上古汉语植物语义造词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一)隐喻与植物名语义造词

Lakoff & Johnson 曾指出:“隐喻的本质是以另一件事和经验来理解和经历一件事或经验。”^{[9]5} 隐喻认知是一种从源域向目标域的象似性映射过程。“隐喻思维的模式就是,一个陌生的、往往是较抽象的、难以定义的认知域,而用另一个熟悉的、较具体形象的、容易把握的认知域去理解,去表达。所以在语言的早期阶段,语义的扩展和新词的产生,就往往是隐喻思维的结果,即新的认知域(认知对象)在象似性类比联想的基础上,用既往经验的认知域去理解表达,新事物的命名,用代表具有象似性事物的旧词去指

称,这实际上可以叫做隐喻式造词。”^{[10]101-106} 认知语义学上所称的隐喻思维在汉语早期的植物名造词中起着重要作用,人们基于事物间的相似性,用代表具有相似性事物的词去指称植物,利用语义分化手段创造新词。如前文的植物名“桂”“瓢”“蕪”“藕”语义造词皆是隐喻思维的结果:

桂,叶似柿形,叶片中有纵纹三道,像古代的圭上的两道纵纹,人们将该植物与“圭”类比,于是将其命名为“桂”。

瓢,瓜皮中所藏的瓜实,与翻开耕地表面播完种子后再覆盖上的古老的播种方式“裹”在“包裹在内”方面有相似性,因此利用语义分化方法隐喻造词。

蕪,浮萍,因其漂浮的特点类似于浮于水面的剖开的葫芦“瓢”,因而又名“蕪”。

藕,荷的肥大多节的根茎,与多末的一种农具“耦”在“多”这个特征方面存在相似性,因此由“耦”语义扩展而创造新词。

再如:白及又名“苻蓿”,其块茎根为指状分歧,似棱有三角,故以“凸”(三隅矛)和“茨”(蒺藜)为喻造词。“菌”为子实顶端圆形,柄亦呈圆柱形的菌类植物,其圆形特征似圆形谷仓“困”,因以为名。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隐喻是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比字。”^{[11]97} 亚里士多德这里说的“种”与“属”的概念可以不局限于生物学上的种属概念,其实可以理解为存在象似关系的两事物之间的语义关系,即两概念不管类属层级对应或不应对,其所指事物都可以用来互相类比隐喻。如前面“桂”“瓢”“蕪”“藕”“苻蓿”“菌”分别与“圭”“裹”“瓢”“耦”“凸茨”“困”隐喻类比,这属于“种”与“种”的借用隐喻。由表示泛指义的侵人的“侵”隐喻特指为辛味浓烈可排斥其他杂木的木桂“侵”,泛指义为白色的“皎”隐喻特指茎中有色白之物“茭白”等则属于“属”与“种”之间的借用隐喻。这两种借用隐喻都是“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从而利用语义手段创造新词。

(二)范畴化与植物名语义造词

植物命名造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对植物认知的范畴化过程。“人们在世界反复的体验上,与客观事物互动的基础上,对事物的属性进行的概括和类属划分,即范畴化。”^{[12]249} 范畴化是人们感知不同事物之间的共同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将不同事物进行归类的过程,其结果是形成范

畴和概念^{[13]199}。

植物名语义造词时为使新词从原词意义中独立出来而创制了大量的植物名专名用字,其字形多数表现为带有表植物类属的形符,植物专名用字的创制是人类对植物客体范畴化的结果。如前文的“岑为艸香,故楞为香木”,宿根自生的“蕙菜”,名为“藻”的浮萍等,其木、草之形符皆表示其植物类属。至于前文论及的上古汉语植物名新词创造存在原词与新词交织黏着(“甘”与“柑”同表柑橘)或用同字形标记两同名植物的现象(“权”既表草又表木),实际是早期人们在认知植物世界时的模糊不确定性的表现,是在范畴化过程中的思考、揣度与尝试。再如,侧子与蓊子,乌头侧根(附子)侧边生出的块根。《本草纲目·草六·侧子》释名:“生于附子之侧,故名。许慎《说文》作蓊子。”《说文·艸部》:“蓊,乌喙也。”换形符为草,所属明确。可见,表类属意义的形符是植物专名用字的主要特征,植物专名用字的产生体现了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范畴化过程。

综上所述,上古汉语植物名的语义造词主要通过原词的语义引申与源义素的孳乳派生两种方式完成,也就是说,利用语义分化手段创造的植物名新词与原词之间存在着词源意义上的联系与词汇意义上的变化。在植物名新词创制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语音或字形的改变,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古汉语植物专名用字的迅速累增。汉语植物命名造词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认知活动,

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结果,其中隐喻与范畴化认知活动在上古汉语植物语义造词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王宇. 汉语词源的探求与阐释[J]. 中国社会科学, 1995(2).
- [2] 张博. 汉语同族词系统性与验证方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3] 张永言. 关于“词的内部形式”[J]. 语言研究, 1981(3).
- [4] 谭宏蛟. 试论一种特殊的词义成分——源义素[J]. 古汉语研究, 2005(4).
- [5] 崔枢华. 《说文解字》声训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6] 俞敏. 俞敏语言学论文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7] 王力. 同源字典·同源字论[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8]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9] Lakoff,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10] 陈建初. 汉语语源研究中的认知观[J].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5).
- [11] 亚里士多德. 诗学[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6.
- [12] Evans V. & M. Green.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troduction*[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3] 陈茜. 语言生态学视角下的中国英语变体的存在与发展[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2).

Research on Word-Making by Meaning of Plants Names in Ancient Chinese

TAN Hong-jiao

(Chinese Language Institut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136000, China)

Abstract: Word-making by meaning is the way that uses the semantic divergence to create new words. It is the important method of developing Chinese Mingwu words and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Chinese vocabulary accumulation during the derivative period. The main ways of making words by meaning in plants names of Ancient Chinese are semantic extension and the derivation of the etymeme. Word-making by meaning of plants names in Ancient Chinese is always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sound and the font. It promotes the rapid accumulation and increase of the characters in proper nouns in plants names objectively. Word-making by meaning of plants is people's cognitive result of the objective world. Metaphors and categorization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Key words: Ancient Chinese; Plants Names; Word-making by Meaning; Cognition

[责任编辑:张树武]